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泥河湾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最新进展。据介绍，此次发现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镶嵌使用细小石器的考古遗存，对于解读东亚及世界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专家介绍，泥河湾遗址群分布于泥河湾盆地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最初，泥河湾盆地多指阳原县城范围，又称“阳原盆地”。目前，泥河湾盆地的概念扩展至蔚县盆地、怀来盆地、涿鹿盆地以及山西大同盆地的广大地区，也称广义泥河湾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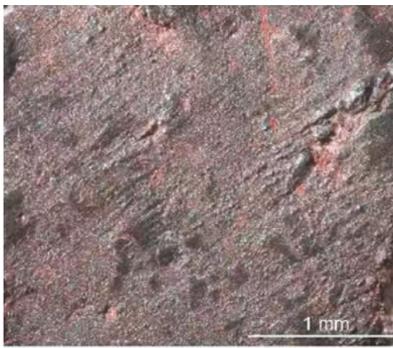
此次“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泥河湾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最新进展。蔚县下马碑遗址第6层堆积距今4.1万至3.9万年，考古发现赤铁矿、火塘及其周边散落的石器、骨器及动物化石碎片等。根据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等技术分析，确认一处富集赤铁矿的染色区，部分赤铁矿表面发现摩擦痕迹，推测为颜料加工遗存。出土石器以砸击而成的细长形小型石器为主，部分细小石器表面发现骨柄残留和线性排布的植物纤维残留，推测是古人通过装饰、镶嵌制作的复合工具，被用来钻孔、加工皮毛、切割植物及动物软组织等。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通报的泥河湾考古项目，是旧石器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更加生动地阐释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技术与环境、审美与精神世界，具有重要价值。

发现中国乃至东亚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和镶嵌使用细小石器的考古遗存

泥河湾考古新进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在下马碑遗址发现的赤铁矿小块表面摩擦痕迹。国家文物局供图



泥河湾考古走过近百年历程

经过几代考古人近百年的接续奋斗，泥河湾考古已取得丰硕成果。考古发现早更新世中期至晚更新世之末5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马圈沟遗址群确认距今176万至126万年之间17个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层，小长梁-东谷坨区域发现距今136万至100万年的7个文化层，马梁-后沟遗址群保存了距今80多万年至35万年的9个文化层。

侯家窑遗址的最新发掘揭示了完整地层剖面。板井子遗址出土距今10万至8.6万年经预处理的石核剥片。西白马营遗址发现距今4.5万年的用火遗迹和肢解、处理动物资源的场所，推测为古人类的临时营地。油房等遗址发现距今2.9万至2.7万年的石叶技术遗存，为探索华北地区石叶、细石叶技术的产生与扩散、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虎头梁遗址群发现距今2万至1万年前后的火塘、细石叶技术石器、装饰品以及陶片等，为探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层序和文化依据。

延伸阅读

要坚持保护第一、强化系统保护，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统筹好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手工艺保护传承；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监测，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对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对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心存敬畏，正确处理历史与当代、

保护与利用、传统与创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积极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成为增进全民族历史自信与历史认知的重要源泉。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

链接



本报记者 齐欣

故宫是世界闻名的遗产地和旅游地，四季都能吸引众多游客。图为2月13日，北京迎来农历虎年的第一场大雪，故宫角楼银装素裹，引来众多市民及游客前来欣赏雪景。

翁奇羽摄

随着世界遗产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遍布全球的遗产地愈发受到关注，遗产与旅游的关系日益紧密，“遗产旅游”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日，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从保护世界遗产、阐释遗产价值、提升社会文化水平、传播国家形象等视角，采访了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张朝枝。

记者：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去世界遗产地旅游？

张朝枝：遗产地往往与人们有着先天的文化与情感联系，也就是身份认同感。比如大家都会想着“保平安”而去登泰山，想着“做好汉”而上长城……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认同和自豪感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激发去看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旅游的愿望。

世界遗产地大都具有罕见的自然美或者文化艺术价值。现在，由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带动，到世界遗产地去“打卡”，往往也成了某种文化品位或消费能力的标签。这些都促使遗产旅游出现了火爆的局面。

记者：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在此背景下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遗产大国。我们有了56处世界遗产，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黄山等世界遗产已经全球知名。在文旅融合的趋势下，遗产地肯定会越来越热。

张朝枝：会的。学术界通常把前往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称为遗产旅游。其实在世界遗产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小众化的文化旅游。当更多的文物、古迹、历史城区演变为世界遗产，“遗产旅游”也随之诞生。随着世界遗产的概念与范围不断扩大，现在遗产旅游也包括所有自然与文化保护地的旅游，不再仅仅限于世界遗产地。

记者：许多人认为，只要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就能带动当地旅游发展。

张朝枝：其实还真不一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旅游大发展，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世界遗产遴选标准与旅游市场选择偏好这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事。世界遗产评选主要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及其相关文件约定的一系列标准，强调各类文化艺术、科学、历史、生态等价值，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大众旅游市场对目的地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游客感官体验来判断的。虽然早先有一些项目仅因符合“罕见的自然美”的标准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但目前这条标准已不能单独使用了，因为专家们对什么是“美”难以形成共识。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一些价值很高的遗产地，至今还很难吸引大众游客。据我的粗略估算，大约40%的世界遗产地因不具备旅游观赏性而很难成为火爆的旅游目的地。

当然，由于“申遗”提升了知名度，使得环境整治加快、政府配套投入增多、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增强，再加上如故宫、长城、泰山这样的项目在“申遗”成功前就已成了著名的旅游地，这确实会客观上进一步推动遗产地的旅游发展。

记者：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认为，旅游给保护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在文旅融合时，旅游会是遗产保护的“麻烦制造者”。

张朝枝：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早在“世界遗产公约”诞生前，一些专家们就觉得战争、城市化、旅游活动破坏了古迹遗址和大自然，因此呼吁对全球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从全球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仍将旅游视为遗产保护的威胁；但随着遗产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多，大家逐渐意识到遗产保护状态与周边社区以及人们生活密不可分，而生计又与旅游紧密关联。此时人们意识到：恰当地利用旅游其实也是遗产保护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90%以上的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停摆了。这对可持续的遗产保护造成了新的“威胁”。



在世界遗产地云南元阳梯田阿者科村，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团队的旅游社区研究计划帮助当地社区寻找可持续发展方式与利益分配机制。图为阿者科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分红大会。杨兵摄

青年是世界遗产旅游事业的积极参与者。2021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世界遗产青年论坛上，来自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为论坛主题“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生计”提供了学术支持。

吴辉摄



大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旅游对遗产保护原来那么重要。

记者：遗产旅游可以给旅游业带来哪些变化？

张朝枝：近年来，旅游发展理念的转变让大家重新认知世界遗产和旅游的关系。20世纪中期，旅游活动的总体规模不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旅游业是无烟产业”观念盛行，认为旅游业销售的是风景，带来的是可观的经

在中国，世界遗产地间建立了双向的价值传播机制，促进旅游、参观者了解世界遗产。图为2021年初，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在苏州博物馆举办的“海棠独秀——大足石刻的发现与传承”展览。王建康摄



江苏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大运河、苏州园林等世界遗产。图为2021年6月，参加“打卡中国——你好，长三角！”网络国际传播活动的外国网红们前来苏州观光旅游。华雪根摄

济效益，对环境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但很快，人们发现旅游业带来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旅游设施过度建设、文化景观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等。这些都极大地危害着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这时，人们开始反思旅游造成的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随之诞生。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旅游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对旅游领域的生态环保问题监督，强制执行绿色标准、旅游承载力等措施。近年来，又直接将生态环境保护状态作为旅游等级景区评定的一票否决条件。这些都促使旅游发展越来越“讲规矩”。

记者：2022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从遗产旅游的特点来看，遗产地旅游应该如何发展？

张朝枝：我们必须树立一种观念，经济效益并不是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世界遗产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智慧。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其遗产价值阐释又与国家、民族自豪感紧密相关。因此，这些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都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一定要适应严苛的约束机制。从过去50年的实践来看，《世界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对世界遗产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遗产申报与管理过程中即要求遗产地制定系统的旅游影响监测措施。遗产旅游也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山大学在云南元阳梯田遗产地指导的“阿者科计划”，成功地帮助遗产地居民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实施“熊猫大使计划”，深入自然遗产地开展自然教育，这些成果很快在国内产生了反响。

记者：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几十年来，世界遗产地旅游实践，对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

张朝枝：我觉得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探索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界很多人认为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小规模、深体验的基础之上，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遗产资源相对较少，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又在快速增长，所以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所面临的压力是外人很难想象的。加入《世界遗产公约》30多年来，我们摸索出了一系列大规模大众旅游背景下保护世界遗产的方法与理论体系。在借鉴和反思了已有的遗产地承载量理论、遗产旅游体验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和利益分配理论之上，也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利用优秀案例。比如长城的保护成效就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得到了高度肯定。

第二，我们也探索了基于东方文化特色的世界遗产地社区参与模式与方法。这些实践表明，为当地社区寻找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促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有效协调世界遗产地人地冲突的根本出路。2021年，我们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世界遗产青年论坛贡献了“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生计”主题，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们也成为2021世界遗产青年论坛的学术支持团队。

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实践中，还较早地系统探索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影响监测体系。早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监测内容，主要关注世界遗产本体，对世界遗产地的关注相对较少。近年来，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推动和学校科研团队的参与下，我国率先在安徽黄山、湖南武陵源、河南龙门石窟建立了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持续监测，同时帮助这些遗产地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实践成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为中国专家进一步参与制订世界范围的负责任旅游目的地评价体系打下了基础。

链接

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以世界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基础，深入挖掘展示旅游资源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内涵，创新发展模式，完善标准指引，统筹资源利用，强化政策支持，保障要素配置，稳步推进建设，打造具有独特性、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景区。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及重大度假项目为基础，充分结合文化遗产、主题娱乐、精品演艺、商务会展、城市休闲、体育运动、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医养康养等打造核心度假产品和精品演艺项目，发展特色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丰富夜间文化娱乐产品，烘托整体文化景观和浓郁度假氛围，培育世界级旅游度假区。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